

领导参考

Ling dao can kao

二〇一四年第三期 总第5期

内部资料 注意保存

重点推介:

- 01 习近平“科技观”立足原动力 补短板免受制
- 02 改革从具体问题抓起
- 04 如何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

聚焦中三角

- 06 湖北设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 07 湘鄂共建大湖经济圈
- 08 专家：“一带一部”催生湘南大商机

探索改革

- 12 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
- 14 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时代渐进
- 17 内地城镇化 关键是让农民获益
- 18 中国国企改革要先理顺管理层“动机”

经济广角

- 21 区域性塌陷 中国经济新苗头
- 23 中国经济困难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 24 复杂经济局面挑战稳健币策

科教文卫

- 26 高考改革不能脱离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
- 27 深公立医院创新机制 为医改试点深路
- 28 专家：医改忌盲目照搬

三农问题 县域经济

- 29 安徽为承包土地确权 构建新农业经营体系
- 30 黔松桃工业园区给力县域经济
- 31 农业规划 不求政绩 但为一村一寨好
- 34 闽率先打造农村电子版阿里巴巴

社会观察

- 35 网络成中国反恐新战场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 36 两大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学术前沿

- 38 解析司法体制改革

老威图书馆

习近平“科技观”立足原动力 补短板免受制

美国多维新闻网 2014年6月10日

习近平近日频繁阐释科技观，足见其执政纲领中对科技创新的重视。在对内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对外面临更为复杂局势的背景下，习近平的“科技观”能否把准脉搏找到科技创新的原动力，关系着科技强国梦的实现。

习近平“科技观”求变

在6月9日举行的中国科学院第十七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二次院士大会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强调，中国科技发展的方向就是创新、创新、再创新，并称若要加快创新型国家建设步伐，中国就要“构建高效强大的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中”。而在6月3日举行的2014年国际工程科技大会上，习近平亦出席并发表题为《让工程科技造福人类、创造未来》的主旨演讲，演讲内容同样强调科技的重要性，科技的发展要从工程科技交叉融合的创新、浸润到生活各个方面、工程科技人才交流等诸多方面综合发展。

事实上，关于习近平执政之后的“科技观”，最早可追溯到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全会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整合科技规划和资源，完善政府对基础性、战略性、前沿性科学研究和共性技术研究的支持机制。”随后习近平更是多次提及科技在各个领域发展的重要性，其中，对于发展共性技术的态度屡次被提及，这也被观察人士认为是习式科技观的关键要素之一。

“共性技术”是科技界较新的提法，国际通用的称谓是“generic technology”。尽管很多国家已将支持共性技术研究作为科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但国际上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共性技术定义。

“共性技术”在中国的定义则更为模糊，一种较普遍的看法是：共性技术是指在很多领域内已经或未来可能被广泛采用，其研发成果可共享并对一个产业或多个产业及企业产生深刻影响的一类技术；也有认为共性技术是对整个行业或产业技术水平、产业质量和生产效率都会发挥迅速的带动作用，具有巨大的经济和社会效益的一类技术。通俗来说，比如在研究下一代电脑之前对“电子技术”的整体研究就是“共性技术研究”。“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等就是一种共性技术。

从以上定义便可看出，习近平多次强调“共性技术”，表明其对中国当前的科技发展现状有着更加微观的认识。其实，正是由于共性技术的短板，导致中国在当下“内外交困”的局面下，科技引领深化改革的口号沦为伪命题，甚至在国际上成为落

他人人口实的把柄。

对内方面，习近平上任之后多次强调实现两个百年奋斗目标，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无疑将起到关键性作用。此前中国一直比较重视在导弹、航天等涉及国际大国地位领域的科技实力，但在更广泛的商业领域缺乏关键技术创新，随着劳动密集产业以及人口红利的转折，经济转型和突破需要借力科技升级。当前中国在产业和技术创新领域中，高端层面受到发达国家的限制、封锁，中低端市场中又面临东南亚国家以及金砖国家的挑战，如果不能更多的掌握共性技术，整体将面临高端失守、低端混战、两头受阻的局面。

对外方面，国际复杂局势以及近期中美在网络安全领域的争执案例表明，中国国家安全亟需借助科技安全的辅佐，以免国家利益因技术缺陷遭“绑架”。而这点在习近平在阐述国家安全时，已经提到了“科技安全”和“信息安全”，而能否掌握更为前沿、核心的共性技术，决定着国家安全的主动权。

另外，科技短板已经成为西方国家攻击中共的“政治理由”。美国副总统拜登在5月28日美国空军学院（Air Force Academy）毕业典礼上声称中国不足畏惧，因为中国缺乏创新能力，“我谅你们也说不出一个来自中国的创新项目、创新改变或创新产品。”拜登的理由是创新能力或创新精神离不开“思想自由”或“政治自由”，而这是中国缺乏的，即使中国理工科毕业生数量是美国的六至八倍也无法抵消。尽管拜登的嘲讽影射有自己的政治立场和目的，但中共依然无法否认中国的“山寨”特色已经引起国际非议之现实。

习近平把脉科技创新觅求原动力

习近平在9日的讲话中提出，要把握重点领域科技发展的战略机遇，选准关系全局和长远发展的战略必争领域和优先方向，通过高效合理配置，深入推进协同创新和开放创新，构建高效强大共性关键技术供给体系，实现关键技术重大突破，把关键技术掌握在自己手里。

习近平“科技观”重点强调“共性技术”可谓有的放矢，理念由创新驱动代替原有的追赶驱动或要素驱动。通俗来说，就是以前是跟着人家走，现在要做领头羊。目的在于科技带动经济转型，着力竞争前阶段的技术创新能力，以期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中，与产业当前发展关系最密切的当属“关键共性技术”（关系到某一行业技术发展和技术升级的关键技术），这是科技创新以及产品链形成的原动力。而由于共性技术研究一般处于竞争前阶段，不能单靠市场机制，需要国家战略层面的支持，一是顶层设计，二是人才投入。习近平在讲话中提出，要着力加快制定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顶层设计，改革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和资源配置体制机制，深化产学研合作，加强科技创新统筹协调，加快建立健全各主体、各方面、各环节有机互

动、协同高效的创新体系。要着力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围绕创新链完善资金链，聚焦国家战略目标，集中资源、形成合力。

习近平还强调：“我们要把人才资源开发放在科技创新最优先的位置，改革人才培养、引进、使用等机制，努力造就一批世界水平的科学家、科技领军人才、工程师和高水平创新团队，注重培养一线创新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

改革从具体问题抓起

《澳门日报》2014年6月7日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六日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时强调，改革要坚持从具体问题抓起，把有利于稳增长、调结构、防风险、惠民生的改革举措往前排，聚焦、聚神、聚力抓落实，做到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实。

凝聚共识稳妥推进

习近平谈到，财税体制改革不是解一时之弊，而是着眼长远机制的系统性重构。主要目的是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加快形成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建立公平统一市场、有利于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现代财政制度，形成中央和地方财力与事权匹配的财税体制，更好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树立全国一盘棋思想，加强组织领导，周密安排部署，正确引导舆论，凝聚各方共识，积极稳妥推进改革。

他强调，推进人的城镇化重要的环节在户籍制度，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是涉及亿万农业转移人口的一项重大举措。

总的政策要求是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有序放开中等城市落户限制，合理确定大城市落户条件，严格控制特大城市人口规模，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实现市民化，稳步推进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

习近平指出，户籍制度改革要充分考虑能力和可能，优先解决存量，有序引导增量。要尊重城乡居民自主定居意愿，合理引导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城镇的预期和选择。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布局、功能互补，搞好基本公共服务，还要维护好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

积极探索总结经验

他表示，完善司法人员分类管理、完善司法责任制、健全司法人员职业保障、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设立知识产权法院，都是司法体制改革的基础性、制度性措施。试点工作要在中央层面顶层设计和政策指导下进行，改革具体

步骤和工作措施，鼓励试点地方积极探索、总结经验。试点地方的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司法体制改革的组织领导，细化试点实施方案，及时启动工作，按照可复制、可推广的要求，推动制度创新。

习近平表示，总的看，改革势头较好。目标是否坚定，决定改革的成败；落实能否到位，决定蓝图的实现。各地区各部门要敢于担当，积极有为推进改革攻坚。推进改革既要管宏观，也要统筹好中观、微观。

要突出具有结构支撑作用的重大改革，把握好重大改革的次序，优先推进基础性改革。中央有关部门要加强对地方改革的具体指导，明确改革政策各个环节的衔接配合关系。各牵头单位要加大年度工作要点的推进落实力度，到人到事，凡事都要有人去管、去盯、去促、去干。要抓紧对领导小组工作要点落实情况督促检查和对账盘点，成熟一个，审议一个，出台一个。

如何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

施蕾生 香港《成报》2014年5月30日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科学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了“进一步简政放权”的主要任务。近日，国务院批转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的意见》，把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列为今年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首位，强调要抓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如何下好简政放权的“先手棋”呢？

首先，要高度认识到这届政府的简政放权的背景和特点，与以往相比，有着明显不同。

新时代简政放权出现新特点一是在“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总框架下，推进简政放权。强调和突出这次简政放权，要更注重与其他改革开放事项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二是在建立中国（上海）自贸区的试验中，引领简政放权。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审批制度改革和“负面清单”、“可复制、可推广”，将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新起点、新标志。同时也是对在中国境内普遍开展的简政放权树立一个典范。这次发改委的意见中，已明确提出：“行政审批事项一律以清单形式向社会公开。加快探索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方式”。三是在推广移动互联网思维的基础上，创新简政放权。当今许多创新的治理模式，无不十分强调资讯化系统平台的基本应用。对政策的及时知晓和有效回馈，以及在较短时期内能充分集思广益，积极推进公众参与等，都发挥着不可估量的重要作用。“制度+资讯科技”，已成为代表时代潮流的改革程式。

简政放权需避免重复折腾

在系统提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框架下，本届政府也将在梳理和规范以下三个方面的关系前提和基础上，开展避免重复或多次折腾的卓有成效的简政放权。一是梳理和规范政府与市场、社会在治理经济、社会与文化、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能关系。可分类制定国家治理经济、发展产业、服务社会及开展公共事务等方面的条例和标准等。二是梳理和规范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推动经济建设、发展社会事业等方面的职责关系。更需要在理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之间的事权等方面做出重大改革的基础上，才能给予充分的持久保障。三是梳理和规范政府与国家，国家与社会、政党、军队等不同方面的职责关系。

这是一道绕不过的坎，必须跨过的河。政府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并不就是国家。国民可以批评和监督政府，但必须忠诚于国家。批评或抨击政府，并不等同背叛国家。而正是让政府的权利在阳光下运行，有利于人民监督政府，激励政府官员为人民服务，履行职责。

综上所述，是推进这届政府有效实施简政放权的重要思路。作为具体的推进举措，还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有所拓展。

如何具体推进简政放权：一是大力改进中央部委办的权力配置。由于，中央许多部位掌管着许多重要的投资资金和项目审批权力，跑“部”进京，驻京办事处多如牛毛等腐败现象屡屡发生。这种现象的长期形成，造成国家急需的资金过于分散，产业发展的审批过于集中，经济管理和宏观调控的效率低下，也客观形成寻租现象的空间膨胀，不同利益集团的土壤滋生。因此，适当集中相关部委的资金投放和公开透明决策程式，可充分依靠资讯平台、专家评审及群众监督等创新机制加以改进。

二是加快实行中国行政区划的调整步伐。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城市化、工业化以及信息化等的加速推进，我国的不同地区都有较大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沿海地区、中原地区，以及资源产能相对比较多的地区，经济规模和城市人口急速膨胀。目前的行政区划现状已经对经济社会发展形成一定的阻碍。同时，也是对进一步简政放权有着制约性的影响。行政区划的调整拟按以下原则制定方案：按照经济实力和城市化规模不同等级进行分类调整；按照不同城市群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分级调整；按照扩大地方自治许可权的发展趋势进行分层调整。

三是大力推进国务院机构改革的实施。国务院的机构改革已经进行了好几轮的调整。这次新一届政府的机构改革，按照“大部制”的原则，也正在积极酝酿和制订过程中。资者认为，政府机构改革，应当在科学制订“国务院部门组成法”的指导下，进行合理部署。

首先要严格依法执政。凡是进入国务院序列的各类领导小组和办公室的临时

机构，必须坚决撤销。也要严格按照“小政府、大社会”的原则，对于经济管理类和专案审批类的机构，则采取相应集中扩并。而对于社会服务、城市治理、公共管理的机构，则相应提供专业宏观指导。今后，凡属于经济类的，尽量依托行业协会（产业）、产业研究院等，进行产业发展指导和规划；凡属于涉及国计民生、国家安全等的重大事项，则加强战略规划和指导等；凡属于投资及运行安全的，则可充分依托财税部门、国有资产管理、工商等监管部门进行运作。

对于国务院组成部门的首长职务、人数配备也必须按照“定职、定员及定编”严格执行。

聚焦中三角

湖北设科技成果转化引导基金

肖晶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21日

湖北省出台《科技成果转化暂行办法及实施细则》，从建立完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体系，扶持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机构发展，引导社会资本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支持高校、科研院所科技人员创新创业，鼓励在鄂企业承接转化本省科技成果，省级科技鼓励向成果转化倾斜等六方面促进全省的科技成果转化。

重点培育100家中介机构

该省科技厅副厅长彭泉表示，与北京、上海、浙江等省市相比，湖北在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体系建设方面缺乏全面权威、统一开放的信息交流平台，因此提出今后将完善统一规范、开放共享的科技成果转化服务工作体系，包括建设集展示、共享、交易、谘询、合作为一体的一站式“网上技术交易服务平台”以及集成果信息、质押融资、评估、担保、出资入股及交易于一体的“技术转让服务应用平台”。彭泉表示，湖北将重点培育100家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机构，设立科技成果转化中介服务补助专项，每年安排不少于1000万元，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支持方式；对符合条件的在省内转化省高校院所科技成果的中介服务机构给与最高50万元的经费补贴。资金方面，湖北还将设立天使投资基金及科技成果转化投资引导基金，通过政府财政按一定规模出资引导，撬动更多社会资本参与科技成果转化。

研发团队收益最高

湖北省财政厅副厅长何大春表示，科技成果知识产权归研发团队所有，研发团队是科技成果转化资产处置收益分配的最大利益获得者。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产生的现

金收益，其70%至99%归研发团队；作价入股形成的股权，高校院所仅以荣誉权参股5%，其余95%归研发团队。据悉，该比例在目前各省份出台的类似政策中位最高。

高校、院所科技成果转化个人所得税政策也有所调整，湖北省地方税务局明确对高校院所科技人员在成果转化过程中取得创办企业或投入受让企业的股份和出资比例时暂不征税，在产生一定现金收入时才征收个人所得税。

湘鄂共建大湖经济圈

张宇《香港商报》2014年5月29日

5月初，湖南省人民政府在长沙召开新闻发布会，首次对外介绍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及其规划部署，根据规划，在湖南省岳阳、常德等地，湖北省荆州市等环洞庭湖区域，共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湘鄂联手打造“大湖经济圈”。按照规划的目标，在环洞庭湖相关区域，湘鄂两省实现水域生态修复、产业转型、湖乡城镇化建设、民生事业、基础设施等领域的跨区域协调发展。

规划上升国家战略

在此之前的4月14日，国务院已正式批复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规划》。“国务院的正式批复，标志着生态经济区的发展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湖南省发改委主任谢建辉告诉记者。

《规划》显示，包括湖南省岳阳市、常德市、益阳市、长沙市望城区和湖北省荆州市，共33个县(市、区)，规划面积6.05万平方公里，2200万常住人口，7152亿元地区生产总值的区域被划为洞庭湖生态经济区。根据规划，生态经济区将着力推进生态系统、产业体系、民生保障和基础设施建设，打造“美丽洞庭”。

“湖广熟，天下足”“八百里洞庭美如画”。富饶的资源、良好的生态、如画的美景，为洞庭湖赢得了诸多美誉，也让众多中外游人纷至沓来。然而，随着时代发展，尤其是“水情”的变化，洞庭湖水面萎缩、环境恶化，经济发展成为湖区发展格局中的“短板”。既要让产业搞上去，又不能让生态掉下来成了洞庭湖区域发展亟待破解的难题。

保护生态协调发展

谢建辉认为，推动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是大势所趋、迫在眉睫。首先，洞庭湖地区战略地位不断提升，随着中部崛起战略深入推进，洞庭湖的加快发展日显迫切，特别是湖南省内长株潭、湘南、大湘西、武陵山区板块相继进入国家战略，而洞庭湖区处在长株潭城市群腹地，是湖南第二大经济板块，加快这一板块的建设，对于加速中部崛起具有重大作用；其次，可资借鉴经验不断成熟，鄱阳湖生态经济区(2009年国

务院正式批复)、黄河三角洲高效生态经济区(2009年国务院正式批复)、山东半岛蓝色经济区(2011年国务院正式批复)等加快建设,为洞庭湖建设提供了先行蓝本;第三,民愿众盼不断高涨。在加快科学发展、加速转方式调结构的背景下,湖区人民热切期待洞庭湖生态经济区通过努力走出一条生态环境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新路子,使地更绿、水更净、天更蓝,让自己过上更加美好富足的日子,迫切期盼党中央、国务院将洞庭湖生态经济区建设上升为国家战略予以决策、给予支持。

在谢建辉看来,生态和经济要紧密连在一起,发展洞庭湖生态经济区,一定要围绕生态经济做文章。谢建辉表示,洞庭湖区域,在承接产业转移当中不能承接污染,“要选好项目,建好项目”。同时,应该在集约发展上做文章。

专家：“一带一部”催生湘南大商机

《香港商报》2014年6月11日

去年11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湖南“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并被写入了今年湖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专家表示,“一带一部”是指湖南处在沿海的后方、内陆的前沿,连接南北;同时长江也流经湖南境内,贯通中西;各种交通网络也以湖南长沙为重要的交通枢纽,这也意味着湖南将成为多个经济带的结合部,未来可获得的政策支持不容小觑。此外,湘南地区劳动力与土地价格相对低廉,交通网络和基础设施日渐完善,更成为承接珠三角和港澳地区产业转移的首选,未来的开发价值不可估量。

地理区位获中央再定义

去年11月初,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湖南考察时,首次提出了湖南位于“东部沿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过渡带、长江开放经济带和沿海开放经济带结合部”的区位优势。“一带一部”成为中央对湖南的新定位,被写入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中建五局有限公司董事长鲁贵卿认为,今年政府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一带一部”的概念,这是湖南战略发展的新机遇和战略地位的新认识。

鲁贵卿说,在中国经济大格局下,湖南经济地理的位置实际上已发生了变化。包括长沙、岳阳在内的长江中游城市圈很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第四极。“现在‘长三角’由长江往纵深发展,中国南北由京广线串起来,东西有沪昆线,经济发展的龙头北京、上海、广州都联了起来,长沙就是交会点。中国东部发达,西部比较困难,两头‘水位’不同。只要把两端一打通,‘水位’就会持平。”怎么来带动西部发展?鲁贵卿说,这就需要过渡带,对湖南来说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在他看来,东部经济发展到一定程

度，其制造业人力资源等成本高，而湖南有成本优势，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具备了造血功能，出现了一些千亿产业。是次政府工作报告把“一带一部”特别提出，显示湖南对其区位优势再评估。

“一带一部”延长外商投资半径

具体来看，“一带一部”给湖南带来何种优势？湖南省社科院教授张萍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首要的突出优势，就是“一带一部”是由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体现了中央决策的高度。作为“一带一部”概念最早的研究学者，张萍早在1987年就曾提出，湖南处于沿海的后方、内陆的前沿，连接南北、贯通东西。到今天，中国的大交通网络在湖南实现了这个布局。从南北来看，从东北哈尔滨到北京、从北京到港澳的铁路和高速公路动脉是连接贯通的，而湖南长沙是其中的重要交通枢纽；并且，京广高铁也已经开通，长沙亦将成为这条高铁中的重要一站。另外，贯通东西部的两个大动脉，沪昆高铁，起点在上海，经过杭州、长沙、贵阳，终点在昆明。目前，沪昆高铁从上海到长沙已经开通，预计明年可开通长沙到昆明。而长沙正处于沪昆高铁的中间站，是毫无疑问的交通枢纽。张萍认为，“一带一部”的提出，令长沙的交通优势被再度放大。能够用最低的成本辐射最大的范围，成为近来许多外资企业纷纷落户湖南的原因。不仅如此，在湘投资的外商，其投资半径仍在逐步扩大，从长株潭扩大至了湘南地区。为好体现“一带一部”优势，湖南已规划了四个板块进行分类制造，核心板块是长株潭，第二个板块是湘南地区，第三个板块是洞庭湖，第四个是大湘西。长株潭是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大湘南是国家产业转移基地、大湘西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就是国家扶贫基地了，而洞庭湖生产经济区，在2013年经国家批准，也成为国家战略生产试验基地。这四个板块目前均已经上升至国家战略地位，以长株潭为核心的湖南对外资的吸引力大大提高。

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优势独特

从产业转移方面看，湖南优势巨大。张萍说，湖南是农业大省，农业劳动力资源十分丰富，而成本较低。并且，从住房和土地价格来说，以如此之大的优势，长株潭的住房价格在全国城市中，排倒数第二位，土地价格也相对较低。港商在湖南所能投资的比较好的领域是畜牧业和高端制造业，在湖南，这两个产业附加值比较高，潜在价值比较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研究员陈耀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湖南承接产业转移目前主要还是面向珠三角。湖南是中国承接产业转移的示范区，主要集中于湘南地区与珠三角联系比较紧密的3个城市，毗邻优势凸显。而在基建方面，湖南交通网络发达，虽然工业化和城镇化程度并不高，但已经做好了迎接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准备，基础设施比较完善，在加上相对较低的人力成本和土地成本，使得湖南具备其他省份所不具备

的，承接珠三角和香港地区产业转移的能力，是一大发展优势。陈耀认为，湖南南部作为国家的产业转移基地，具备很多其他城市所不具备的政策优势，并且整个湖南的工业化仅仅处在中级阶段，城镇化相对发达省份也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是这些差距在“一带一部”的区位优势之下很容易转变为发展的潜力。这样看，湖南的发展前景是可以期待的。

湖南师范大学资源与环境科学学院导师李晓青认为，区域的要素禀赋差异是区域产业互补性的前提，区域间产业的梯度性为区域融合提供了可能。湖南地广人多，矿产品、农产品资源都很丰富，这些资源正是广东经济快速发展所必须的。要素的流动支持了广东经济的持续发展，要素的不完全流动又吸引了一部分产业赴湘发展，成为产业转移的直接推动力。基于不同要素禀赋所形成的产业梯度格局为产业转移提供了可能。珠三角地区正面临国际产业调整和升级，必然有部分产业难以适应当地高地价、高工资、高环保要求等压力而外迁转移。湖南与广东省存在明显的产业梯度差异，如劳务成本低于广东省约40%-50%，工业用水价格比广州等发达地区低近30%，综合营销成本只相当于广东74%，湖南正是利用这些优势条件大力发展加工制造业。利用丰富的土地、水、热资源，大力发展创汇农业，建立农副产品加工供应基地。

长沙物流业或成待掘金矿

在今年湖南省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一带一部”进行了精辟的阐述，那么，以长沙为中心，湖南如何抓住是次重大发展机遇？长沙通程实业集团副总经理侯跃认为，“一带一部”的定位指出了湖南的区域特点和希望。湖南计划大力发展现代物流，应该说也是切合这个定位的。公路、高铁、铁路、航电枢纽包括航空，长沙的交通优势、物流优势应该还是很明显的。通程的现代物流中心也是奔着这个目标去的。市场是两个很关键的要素，人流和物流。首先得有人流，人流的集聚需要物资，物流就会向人流集中的地方流动。物流不会自己跑，必须要有人来推动物流。那么人流和物流相互叠加的集聚，就会形成很大的市场。

长沙市工信委党委书记、主任赵跃驹表示，中央对湖南所处在中国经济板块中间“一带一部”的定位是非常精准的。长沙所处的位置是中国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性中心的位置。实际上高铁的建设说明了这一点，以长沙为圆心，5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有3亿人口的集聚，以1000公里为半径画一个圆，有7亿人口的集聚，区位优势凸显。赵跃驹认为，“一带一部”的定位，使得长沙处于巨大市场中心位置的地位越来越凸显，出现了汽车厂聚集的情况。未来中国汽车制造业，可能其他的成本都会趋于一致，材料成本、制造成本、管理成本、营销成本、人工成本可能大家都会做得差不多，但是决定企业有没有盈利，有没有利润的，可能是物流成本。他说，比如从北京运一台车到长沙能够获得利润，但是运到广州和南宁成本更高，导致利润降低。那么

如果在长沙进行汽车制造，则运往上海、北京、成都、西安、南宁的物流成本基本是均等的。赵跃驷把中国的地图与欧洲地图作对比，认为长沙的位置相当于欧洲的法兰克福。他说，如果未来把长沙建成亚洲的法兰克福，国际航班在长沙降落，通过高铁再分散到中国各个地方，长沙未来的发展前景将十分广阔。

湘南可享承接转移特殊政策

由于与珠三角毗邻，湘南地区与长沙的发展战略大不相同。

大湘南是指湖南的郴州、衡阳、永州。湖南“十二五”规划在实施区域发展总体战略的表述中，对“加速崛起湘南”的提法是：充分发挥湘南区位、资源优势，重点对接粤港澳和北部湾经济区，提升合作层次和水平，抓住机遇大力承接产业转移。

有论者指，大湘南承接产业转移具有明显的区位优势。它地处梯级过渡地带，拥有土地面积57153平方公里，人口近1800万；2008年三市GDP达2346亿元，约占湖南全省的23%，举足轻重。如何发挥其独特区位优势，使之成为湖南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的重要基地、接受粤港澳经济辐射的先行区域，一直是湖南决策层次思考和探寻的重大课题。湘南三市，紧邻广东、广西、江西三省区。是湖南省面向南部沿海地区的战略要地，已经逐渐成为东、中、西三大梯度承接的重要地带，有望成为珠三角区域经济中重要的有色金属深加工基地、出口加工基地、能源基地、优质农产品基地和旅游休闲基地。

研究表明，从区位条件看，作为珠三角对外辐射的第一梯度区，大湘南是沿海产业转移的理想之地。因为其原材料采购半径与制成品发送半径又比沿海大为缩短，而且可以全方位360度地辐射出去，投入的产出率高。此外，湘南地区承接产业转移有明显的政策优势。2007年，湖南省确定了敞开南大门，对接粤港澳的方针，加快推进湘南大开发。在产业政策方面，支持三市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对纳入省50个产业集群发展规划、投资超过5000万元以上的产业集群发展项目和纳入省“双百”工程的重点技改项目，予以重点扶持；在土地利用方面，加大对三市的支持力度，重点支持园区经济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优先保障其用地需求；并在财政金融方面，重点提高财政新增增量在市县留成的比例，加大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加大对湘南地区先进制造业、信息技术产业和具有自主品牌、自主研发产品的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加大对县域经济、新农村建设和中小企业的信贷支持力度。

中国需明确目前反腐与改革的关系

刘胜军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4年6月16日

纵览中共十八大以来的时局，有两条关键主轴：一是反腐，一是改革。这两者对中国下一个十年的经济社会格局都至关重要。截至目前，反腐战线成果丰硕，反腐范围之广、触动层级之高，令观察家惊讶，凸显新一届领导层的反腐决心。与反腐相比，改革的推进就难言顺利了，而是阻力重重，明显例证就是李克强总理频频警告官员的“不作为”。

正确把握反腐与改革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反腐是手段，改革是目的。目前中国的反腐行动应是为了促进改革而实行，而不宜为简单地为了反腐而反腐。从法治和社会公平正义角度出发，当然应该有贪必反。但从改革大局出发，在现阶段“有贪必反”却未必是最优策略。相反，现阶段应该实行以促进改革为目的的，暂时性的“选择性反腐”。

首先，中国目前的腐败主要是体制腐败，是体制缺陷所导致的。如果不通过改革来转变体制，反腐力度再大也是治标不治本。贪官靠抓是抓不完的。古有“朱元璋将贪官剥皮反腐”的历史殷鉴，今有河南交通厅连续四任厅长前腐后继。阿克顿勋爵有言，“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反观当下“半统治半市场的经济”，官员掌握巨大的经济资源支配权、审批权，而又没有健全的监督制约机制，时常出现“一把手说了算”，正常的人性是难以阻挡如此巨大的权力诱惑的。刘志军任内推动总投资高达2万亿的高铁，而且在招标时可以“点招”，想不腐败都难。

邓小平曾说过：好的制度使坏人变好，坏的制度使好人变坏。由此推论的反腐与改革的逻辑应该是：改革才是消除腐败的釜底抽薪的根本之策。如果《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能真正落实，“让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大幅度削减官员手中的权力，中国的腐败会自动减少一大半。所以，为改革护航应成为反腐的首要目标。

其次，不少官员的腐败具有“被动”的性质，虽然按照法律规定已属违法，但从情理上有可原谅之处。一方面，官员的账面合法收入与手中的权力形成强烈的反差。正部级官员孟学农坦承自己的年薪只有20万元这样的收入连大企业的中层职位都不及，而且也难以在一线城市体面的生存和生活（高级官员虽有医疗等方面的特权，但毕竟是非货币化福利。因此薄熙来当年在记者会上就遭遇了薄瓜瓜高昂留学费用从何而来的尴尬质疑）。因此，灰色收入就不可避免地成了官员收入的重要来源。王小鲁

的研究发现，2008年中国灰色收入高达5.4万亿，相当于当年GDP的17%。一个具体的例子是：目前中国预付费卡市场已超过万亿元。其中的含义你懂的。官员为生存而贪腐，这是不得不正视的社会现实。

另一方面，在体制性腐败不断蔓延的情况下，腐败的网络不断扩散形成密不透风的网，最终导致对“不腐败官员”的排斥。也就是说，对很多官员而言，如果不腐败，不仅难以铺就升迁之路，恐怕在体制内能否生存下去都是问题。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牵出现象”：但凡一个官员落马，背后时常有一个复杂的政商网络。以茂名市委书记罗荫国落马引发的广东茂名腐败窝案为例：2012年广东省纪委官方通报，此窝案共涉及省管干部24人、县处级干部218人，波及党政部门105个，茂名市辖6个县(区)的主要领导全部涉案。但被立案查处的只有61人。不过，2014年中央又“复查”茂名窝案，原茂名市政协主席冯立梅被调查。可见这种官场腐败网络的复杂性、不可抗拒性。鉴于当前腐败的普遍性，以及一些腐败的“被动性”，“有贪必反”既无可能、也不必要。

再次，反腐虽有“立威”之效，有助于树立中央权威，为推动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但是，“有贪必反”也会导致官员不知所措，出现消极心态、避险心态，加剧改革推进中的“不作为”。新一届领导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之后，可谓“踏石留印、抓铁留痕”。十八大后“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总数已经超过30人，相当于前十年的一半。2013年被处分的县处级以上干部也高达6400多人，比2012年同期增长36.3%。在风声鹤唳的肃贪风暴之下，连“吃喝”都可能成为官员落马的线索。在这样的情势下，“不作为”就成为官员的最优策略。在中国经济下滑趋势明显的情况之下，掌握资源和执行路径的官员能否作为实则较以往更为重要，反腐力度的“技术调节”也就尤为必要。

因此，综合来看，当前的反腐策略在赢得民意支持、树立中央权威方面是有效的，但对目前形势下推进改革未必是最优的选择。从十八届三中全会至今已有半年多，但改革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2014年5月李克强总理怒斥，“我在基层调研时注意到，有些地方确实出现了‘为官不为’的现象，一些政府官员抱着‘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甚至‘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的态度，敷衍了事。说得难听点，这不就是尸位素餐吗？”阻力不仅在基层，李克强也责问部长们：“在座的各部委，国务院的各项政策措施落实到位了没有？你们各自的责任履行了没有？各位，你们要‘守土有责’啊！希望我们的一些同志，不要贪恋手里那点小小的权力，阻碍政府工作的大目标。”

当前要加快改革，让反腐成为推动改革的“正能量”，应该从“有贪必反”转向以改革为导向的“选择性反腐”。当然，反腐也应尽量规避沦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因

此“选择性”的标准应该是：对积极推动改革的官员应该降低反腐力度，对阻挠改革的官员应该加大反腐力度。这样的“反腐促改革”策略要想奏效，还必须让官员能明确感知到这样的“选择性标准”，进而改变自己的行为取向。为此，中央可以考虑发出明确的信号：将推进改革的表现作为官员考核的重要标准；在反腐时优先“关照”那些阻挠改革的官员；对落马的官员，要多宣传其拖延和阻挠改革的具体表现。

不过我们必须谨记：选择性反腐，只是推动改革的“阶段性策略”。一旦改革得到实质性推进，中国还是应该致力于消除“选择性执法、弹性执法”的痼疾，建立可信赖的法治。

中国地方政府自主发债时代渐进

美国《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4年5月30日

中国正在试图把更多的举债权力下放给地方，这也意味着今后地方政府除了可以自主发债，还必须自己还债。5月19日，中国财政部网站发布了一份关于印发《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的通知，该通知称，中国国务院已经批准了上海、浙江、广东、深圳、江苏、山东、北京、江西、宁夏、青岛试点地方政府债券在2014年自发自还。

与以往明显不同的是，此次出台的“试点办法”明确提出“试点地区承担债券还本付息责任”，并要求试点地区应当建立偿债保障机制，统筹安排综合财力，及时支付债券本息、发行费等资金，切实履行偿债责任，维护政府信誉。

中国东方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邵宇在接受采访时说：“这意味着今后地方政府会普遍转向自主发债，也意味着进一步明确了偿债的责任主体。”东方证券一份最新的研究报告评价说：“政策的目的是提供（或者培育）一条市场化、公开化和透明化的地方政府融资渠道，以替代、置换地方政府通过其他影子银行渠道（如信托等）进行的隐形、高成本举债。”

由邵宇撰写的上述研究报告认为，在政策的操作层面，除了举债额度受国务院限制外，其他方面几乎完全市场化，由地方政府、承销商和信用评级机构自主安排进行。

长期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在财政上没有多少自我选择的权力。在1979年前的计划经济时代，中央控制着全部财政的收支，地方政府不存在债务问题。但在改革开放后，中国地方各级政府面临城市基础实施建设的压力，开始逐渐通过多种渠道举债。2006年至2009年的三年尤其是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爆发后，为完成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项目的地方配套资金，各个地方政府的投融资平台如雨后春笋般迅速成长起来，缓解

了地方公共投资的压力，但同时也导致地方债务激增，风险积聚。

但在2009年前，地方政府从未被允许有发债的自主权。因为中国1994年的《预算法》明确规定不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之所以做出此项规定，是因为中央限制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与《预算法》相配套的，是1994年分税制改革，意在使财权向中央集中。

中国的分权财政体制和对地方政府发债的约束逼迫地方政府只能通过招商引资、土地财政或者依靠影子银行等来完成GDP目标和地方公共建设。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导致了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举债成瘾，地方债务迅速膨胀。根据国家审计署去年底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结果，截至2013年6月，地方政府负有偿还和担保责任的债务总额为17.9万亿元，比2010年的10.7万亿元增长67%。但这一数据可能被低估，在去年4月份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中国前财政部部长项怀诚说，地方政府债务超过了20万亿。

中国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在今年3月份的一个高层论坛上说，地方政府债务里面很大部分是地方政府的隐性负债，不透明、隐性和它相伴随的明显的不规范性，就是风险的一个重要来源。

为了清理地方借债乱局，中央开始考虑逐步向地方政府放开发债权。在此背景之下，2009年，国务院同意地方发债，但规定必须由财政部代理发行，债券到期后由财政部代办还本付息，然后地方政府再向财政偿还相关款项。中国政府在2011年年底开始允许上海市、浙江省、广东省、深圳市开展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2013年，地方政府自行发债试点扩大到江苏和山东两省。然而这些债券依然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财政部继续代为还本付息，中央财政实际上充当了“最终偿债人”的角色。中国的一家研究咨询机构海通证券的研究员陈峥嵘也认为，自行发债是从代理发债走向自主发债的一个过渡形式，本质上并未改变财政部的代发代偿机制，这种发债模式在实践中容易造成偿债主体定位不清。

对此，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许小年当时质疑称“地方债的偿还若由中央财政担保，会引发地方政府的“道德风险”，“借的冲动强，还的责任弱，埋下债务危机的祸根。”

地方政府自行发债仍被认为只是为狂热的地方投资开辟的一条融资途径，无益于缓解地方债务风险。因为，地方政府自行发债的政策里也缺少对于责任人的处罚措施。债券发行方没有破产风险，债券发行人也没有连带责任，这就意味着地方政府缺少对举债进行仔细风险评估的动机。新的政策试图弥补偿债主体定位不清等制度缺陷。《2014年地方政府债券自发自还试点办法》规定，试点地区承担债券还本付息责任，并且，试点地区发行政府债券实行年度发行额管理以及按照有关规定开展债券信

用评级。

根据《证券日报》的最新报道，财政部国库司有关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2014年自发自还债券总规模为1092亿元。试点地区债券期限为5年、7年和10年。

邵宇认为，此次试点改革的另外意义之一是“为剥离地方融资平台承担的政府融资职能提供支持”。

地方融资平台是1994年分税制以及地方事权与财权长期不匹配的产物。虽然地方融资平台缓解了地方政府公共投资紧张的局面，但却助长了地方政府盲目举债的风气。尤其是在金融危机之后，随着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的飞速发展，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的负债规模也在急剧膨胀，加重了中国地方债务危机。国家审计署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底，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10.89万亿元，其中，融资平台公司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4.08万亿元，占总额的37%。近两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正逐步进入还债高峰期，约37.5%的贷款在2013年至2015年内到期。目前集中还款风险迫在眉睫。此次允许地方政府自主发行债券，也是还债压力所迫。

剥离地方融资平台已经被列入地方债务改革的清单。中国国务院在不久前批转的《发展改革委关于2014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任务意见》中，已经提出这一政策目标。

邵宇说：“核心是用长久期低成本公开化的融资方式，替代短久期高成本暗箱的影子银行融资，缓解地方政府资产和负债的不匹配情况和流动性风险。”

但形势并不轻松，人们仍担忧一不小心中国仍会掉下债务悬崖。海通证券最新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中国地方政府的经营性和投资性净现金流为负，且每年需额外举债覆盖利息等支出。地方政府若不出售资产和压缩投资，四年后地方政府债务率将达国际通行的60%警戒线标准。一个重要的前提是，转轨时期地方政府过于庞大的事权与有限的财权之间的矛盾是形成地方债务风险最主要、也是最根本的原因。如果只赋予地方政府自主发债的权力，但不彻底改变地方财权与事权之间的矛盾，根本问题仍难以解决。

目前，地方政府举债的破产机制、追责机制以及地方债务评级制度等仍未建立起来。邵宇说：“这些机制的建立是必须的。”

更关键的是，在中国，仍然没有人可以限制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经济学家们用一个更专业名词形容这种尴尬状况——预算软约束——政府支配财政资源的行为缺少硬性的制约，结果导致政府官员无所顾忌地胡乱花钱。

邵宇认为，如果不解决地方政府强烈的投资冲动以及投资约束不足之间的矛盾，赋予地方自主发债更加危险。他说：“在新一轮城市化的基础设施投资中，应全力启动PPP（公私合作关系）机制，外包城市化的职能给市场化主体和民间资本来完成。”

内地城镇化 关键是让农民获益

贺军《香港经济日报》2014年6月23日

中国如果要寻找支持经济的中长期动力，新型城镇化是一个重要选择。

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着眼于农村发展的城乡一体化将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增量来源，其中的重点是小镇和乡村建设。

2013年中国有建制镇20,113个，有大约6.3亿人生活在农村。如果不把乡镇建设好，中国的城镇化难言成功。新型城镇化成功与否，表面在城市群，关键在乡村。

如何着手建设中国的小镇和乡村？是摆在各级政府和数十万个乡村面前的现实问题。在过去的城镇化模式中，乡镇发展沿用的是城镇的“土地经济”模式——政府投资征用集体土地、政府拍卖土地、商业化开发土地，由于政府处于强势，这种方式往往会侵占农民利益，容易引发社会问题。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这种简单粗暴的模式，在政策上和经济上都已经行不通了。

当前的乡镇建设面临的直接问题是资金问题。据我们的调研，在江苏和浙江一些富裕的乡镇，农民的拆迁成本已经高达每户100万元。如果仍采取过去以政府投入为主的方式，已经难以推动。有财力的地方都已经感到十分吃力，更不用说财力不足的地方政府了。

在房地产市场走下坡路、不断强化农田和宅基地保护的背景下，由于缺少资金，很多地方的城乡一体化建设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

那么，今后的乡镇建设中，新的资金来自何处？许多基层地方官员对土地制度改革寄予厚望。在他们看来，农民现在所拥有的重要资产就是土地——几十年承包权不变的农地使用权，以及宅基地使用权。如果能在政策上允许农民的土地资产进入市场，无疑能够启动沉睡的土地资产价值，在保证农民利益的同时，为乡镇建设引入大量的市场资金。但农用地短期内市场化运作的可能性不大，因此地方政府对于宅基地的市场化操作充满兴趣。

然而，正是在宅基地的市场化问题上，现行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权法》等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根据有关法规，(1)宅基地使用权的主体只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城镇居民不得购置宅基地，除非其依法将户口迁入该集体经济组织。(2)宅基地使用权的用途仅限于村民建造个人住宅。(3)宅基地使用权实行严格的“一户一宅”制。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4)宅基地具有福利性，宅基地的初始取得是无偿的。在这些法规之下，城市人口购买农村宅基地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十八届三中全会给宅基地制度的改革带来一丝希望，报告提出：“赋予农民更多

财产权利……保障农户宅基地用益物权，改革完善农村宅基地制度，选择若干试点，慎重稳妥推进农民住房财产权抵押、担保、转让，探索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渠道。建立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市场，推动农村产权流转交易公开、公正、规范运行。”

如何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如果不在农村宅基地制度上有突破性的改革，恐怕难以实现这个目标。

城市人口回流乡村 纾城市病

从农村宅基地的需求来看，这方面的市场需求已经不成问题。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城市化进程，不仅创造了大量的城市财富和富裕人群，也制造出了大量的城市病。

“逆城市化”现象在中国多个城市已经不同程度地出现了，许多城市人群愿意选择去郊区或乡村环境较好的地方购房、居住、养老；而在这些乡村，也出现了不少因人口迁移到城市而荒废的民居。

如果能实现这两种供与需的结合，无疑会为农村发展和建设引入大量资金。城市资金和人口的进入，除了带来建设资金外，还会带来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医疗、消费、人才、文化等多种要素，这无疑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所迫切需要的条件。只要在乡镇规划上加以引导和严格限制，乡村建设完全可以在受控和可持续的基础上得到显著提升。

未来中国的城镇化决不只是人口向城市的单向流动，城乡一体化也不是单方面的城镇建设，如果没有农村的经济发展、基建升级、生活方式改善、公共服务水平提升，城乡一体化将是残缺不全的。我们需要一部分有资金、有需求、有文化的城市人口流向乡村，这不仅可以疏解大城市病，农村也能因城市资金和城市文化的进入而发生变化。

这一切发生的条件已经成熟，唯一的障碍就是现行的土地制度限制。我们理解政治家们在推动中国土地制度改革上的政治谨慎，但如果不进行土地制度的改革，中国的城乡一体化将会在制度上僵持不下。

未来城乡一体化的关键是发展和建设乡村，在土地制度改革上取得一定的突破，对于城乡一体化发展十分重要。

中国国企改革要先理顺管理层“动机”

侯延琨 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 2014年6月5日

去年北京十八届三中全会无疑掀起了新一轮的国企改革浪潮，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第三次提出国有企业改革了。1978年的第一轮改革重点在于放权让利，完成了国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

之后1992年第二轮改革则建立了现代企业制度，通过股份制改革来完善了国有资产管理体制。随着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以及世界500强梦想的跃进，国有企业受益于政策、资源等优势，逐渐成长为如今规模庞大的巨型企业。

但过去20多年，高速的经济发展掩盖了国企自身的一些问题。随着中国经济增速逐渐放缓，国企运营效率低下、资源配置低效、产能扩张无序等问题逐渐显露，国企改革迫在眉睫。

我们的研究结果也证实了国企所面临的挑战。无论是短期还是中长期，我们发现民营企业的财务表现和投资回报率都明显优于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的过去3年平均总资产收益率（ROA）和3年平均净资产收益率（ROE）、毛利率和净利率都明显高于同行业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而在企业的成长性和股价投资回报率方面，民营企业不但5年平均营业收入增速是遥遥领先，其股票投资回报（如ROE，ROA）也明显高于国有企业。

此外，无论是在南开大学的《2012中国上市公司治理评价报告》，还是上证公司治理指数和香港GMI公司治理指数里，民营企业的公司治理指数普遍高于国有企业。这里，公司治理指标包括内部治理（如董事会、监事会、股东会之间的相互制衡）和外部监督机构（如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的公正和制约）。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为何民营企业在运营效率和创新能力方面会领先于国企。国企的问题不在于属性，而在于管理。然而，在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上，国企改革面对的是一条荆棘之路。要改变公司治理制度上的“先天不足”，不仅仅需要政策上的智慧，还需要釜底抽薪的勇气和决心。

自十八届三中全会以来，上海、广东、安徽等地纷纷开始试行国企改革方案，以破除各种形式的行政垄断为目的，以规范经营决策、提高企业效率、增强企业活力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同时，坚持机会平等，废除对非公有制经济各种形式的不合理规定，消除各种隐性壁垒，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在管理层股权激励制度上，让国企高管可以合法的受益于企业的盈利增长，同时将管理层的利益与中小股东的利益捆绑在一起。

以上举措一定程度上鼓励了市场对于“国企改革”概念的关注，但是股价的表现反应一般。究其深层次原因，笔者认为市场对于改革方案能否标本兼治仍持谨慎态度，对改革的长期效果持观望态度。

良好的公司治理并非简单依赖一套完整的程序、惯例、人事与合规制度来影响企业的日常管理。第一部阐述公司权利和义务的《公司法》在1993年正式生效，经过20多年的发展，国企的公司治理架构似乎仍旧“貌似神离”。虽然三会（股东会、董事会、监事会）皆具，但是三者之间的有效制衡尚待改善。笔者认为良好的公司治理最

困难的问题在于解决如下问题：追求利润和控制风险的平衡，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的平衡。让企业在相互矛盾的目标中，寻找较为完美的平衡并推动企业不断地发展和壮大。而在这其中管理层潜在的道德风险不仅仅是靠制度、条例和法规所能解决的。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分析，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不是一个制度问题，而是道德风险的问题，投行高管过于注重短期的经济利益，而有意无意的放松了风险管理。

可能的方向是什么？首先，国企改革要解决管理层的“动机”问题。由于国有股东一股独大，无论是企业的高管任命还是战略决策某种程度上很难避免地会受到政府行政力量干涉。虽然短期来看，资源调配效率高，执行力强，可以达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效果，但与此同时企业的长期利益被忽视。一些高管也把自己看成是一位政府官员，而不是企业的职业经理人。他们的职业规划往往是希望能够通过扩大企业规模，贡献GDP增长，提高就业率来实现在政府系统内的升迁机会，而非追求企业利润，创新和可持续发展。企业的并购、整体上市利润释放，融资时点等重要决策往往未能考虑企业实际发展需要，更不是中小股东的利益。而解决“动机”这个问题的一个“极端”解决方案就是在无关国家战略安全领域将国有股东转变成为被动的财务投资者，引入中小股东代表进入董事会，放权于中小股东，让监事会、股东会各司其职，让企业以经济效益为中心来不断发展和提升效率。

其次，应该设法解决“道德风险”的问题，而激励机制的完善是必不可少。目前，大多数国企管理层无法享受企业的利润增长，所以在一定层面上，管理者们会缺少提高企业净利润的动力。相反他们会通过各种理由增大开支，如增加雇佣劳动力，扩大投资等来获得对企业更大的管理权，以便于支配公司经营所产生的利润。即使以最近宣布的国企改革案例来看，国企管理层在薪酬方面，相比民营企业管理层来讲，如果不考虑隐形收入的话，明显偏低。这不仅容易导致管理层出现工作动力不足，也有可能使管理层从根本上失去追求企业利润的动力，从而引致利用职权，以权谋私等损坏公司长期利益的行为。笔者认为国企管理层的“动机”和“道德风险”是导致中国许多工业领域现在出现严重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三，就是要引入竞争。我们的研究发现同为国企，地方国企过去5年的财务表现，运营效率的指标和投资回报率都明显高于中央国企。中央国企多为垄断性企业，有其得天独厚的竞争优势。一方面中央国企有服务于社会福祉的使命，无法充分享受垄断利润。另一方面，地方国企在跨地区竞争时失去了当地政府的支持，不得不靠产品在市场上与其竞争对手一决高下。久而久之，地方国企在市场竞争中逐渐提高了运营效率和产品的竞争力。所以引入私有企业的竞争，创造私有企业能够与国有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某种意义上来说，直接关系到长期国企改革的成败。

笔者认为这一轮的国企改革应双管齐下，公司治理制度改革使管理层的利益与公

司长期利益和短期的利益同时挂钩，最大程度上降低系统中的道德风险，从而释放被浪费的潜力和动力；同时引入市场竞争，迫使国有企业提高经营效率，产生优胜劣汰的机制，从而实现中国的经济转型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经济广角

区域性塌陷 中国经济新苗头

香港凤凰网 2014年6月12日

中国经济不会如欧美国家那样突然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房地产泡沫破裂，但有可能出现逐渐蔓延式的区域性塌陷，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不好，或者宏观经济长期找不到增长点，最终所有区域都逐渐进入塌陷。区域塌陷其实反映的是全局问题，目前在经济界是无解的，唯一的方式只有全局尘埃落定，区域性问题的解。

关于中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目前在世界上有两派观点，一派认为，中国经济将崩溃，主要观点是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另一派则认为，中国经济好得很，崩溃是阴谋论，主要观点是政府掌握强大资源。不过，从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展现出来的状况看，也许这两者都不是中国经济的未来答案。

中国经济此轮下行的方式，将具有中国特色，它不会如欧美国家那样突然发生金融危机，或者房地产泡沫破裂，然后由金融货币的紧缩传导到其他部门和行业，最终导致企业大面积关门倒闭，工人下岗，并引发社会问题。

中国经济此轮将可能以逐渐蔓延式的区域性塌陷（或称“板块状塌陷”）为主要调整方式，首先从某个区域，然后接着其他区域，这些区域越来越多，如果宏观经济管理不好，或者宏观经济长期找不到增长点，最终所有区域都逐渐进入塌陷。

目前看来，区域性塌陷还是非常让人震惊的，从今年一季度各地经济数据看，煤炭大省山西、钢铁大省河北、以及东北地区，尤其是资源大省的黑龙江，GDP排名均靠末尾。

这些变化只是一年之间，去年这些地区的GDP增长大概都在10%以上，今年突然就将增速跌至4%到5%，增速几乎被砍去一半，真是让人始料未及。

山西省最典型，其经济增长方式是成也煤炭，败也煤炭，当年以煤炭资源发展起来的经济，去年煤炭价格下跌11%，今年煤炭还在深深探底，到目前尚未看到触底信号，全省的经济就突然出现了一个硬着陆，煤炭一业不兴，百业萧条。

当年陶醉在挖煤的兴奋中，根本没有想到煤炭也有没人要的一天，没有由此发展

更加有发展后劲的其他制造业、服务业，尽管在旅游文化等领域有所探索，但终未形成气候，不能担当中流砥柱的大任。

山西省会太原一季度GDP同比增长仅0.1%，2013年同期这个水平时11.9%，2013年全年GDP增长为8.1%，太原拥有430万人口。值得注意的是，一季度太原工业产出下滑9.3%，固定资产投资增长25.5%。

尽管山西政府已经搞了好几个“煤炭N条”，但目前看来仅仅是务虚的口号，难有切实措施，诸多烂摊子根本未有下手之处。

其实，中国经济以区域塌陷的方式下滑，早有征兆，2012年温州和鄂尔多斯[0.00% 资金 研报]一南一北，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房地产价格下滑，外来人口撤离，经济一下子进入一蹶不振。此后这种情况在陕西的神木以及海南再次出现，其实其他一些地区比如河南和陕西等地民间借贷资金链断裂，给当地经济造成重大打击，也属于区域性塌陷的一部分。

而今年江苏和浙江的经济尽管由于基础厚实，数据上看来没有出现过大的下滑，但是这两个地区趋势下滑的总量却不可小觑，这两个身处长三角的中国经济龙头，其经济下滑的又与山西、河北等不同，他们不是由于资源价格下滑，而主要是由于中小企业遇到外贸下滑的影响，更重要的则是其产业升级速度过慢，产品技术含量过低，没有核心竞争力。另外还有广东的东莞也属于区域性塌陷的一部分，也是由于中小外贸型企业受到外贸收缩的打击。

中国经济为什么会以区域性塌陷的方式下滑？

一是这些地区下滑之所以最早，也最严重，是因为他们的基本经济潜力不能支撑这样的增长，只是当年四万亿刺激政策，让他们承担了他们其实承担不起的任务，经济增长具有泡沫因素。比如四万亿对于“铁公基”大规模投资，直接刺激了经济实体对能源和钢铁等基础原材料的需求，煤炭和钢铁还有电力等就成为抢手货，于是价格飙升，而资源大省则无视短期政策的长期负面影响，大肆扩大产能，产能过剩，当四万亿退出，需求减弱，价格陡降，于是大量煤炭就卖不掉了。

二是中国经济到目前还是政府牢牢控制下的所谓市场经济，一切资源都控制在政府手里，政府可以予取予夺，所以政府有着强大的控制力。

尤其是政府牢牢控制着金融体系，作为一个经济体的血液系统，这样的强力控制，将不会出现如西方那样一家银行发生倒闭，或者一个衍生品市场发生风险而最后传导至其他市场，最终导致大面积的风险，如果是这样，2012年云南和上海城投债的违约危机、2013年6月某银行违约导致的钱荒以及近期的房地产市场萧条都可能导致全局性的金融风险。

但是现在中国政府的政策底线是不能出现全局性金融风险，而全局性金融风险又

是通过局部性金融风险酝酿的，所以起初政府会动用所有资源让其不会发生局部性金融风险，所有资源都会倾斜于那些可能发生金融风险的地方，这样整个市场的风险会被平摊给每一个社会主体包括个人，于是突然爆发危机的能量再次弱化，分散到其他市场主体。

那么当有限资源向政府控制的领域、向金融领域、向中心城市倾斜时，外围的中小企业、地方政府、经济落后地区此前发展过猛，现在突然失速，有限的资源不能照顾到他们，那么就只能塌陷了，比如河北，四万亿时期发展过多的钢铁，这两年钢铁需求疲弱，加上环保压力大，经济马上就疲弱了。

最明显的是地方债，四万亿刺激时期，地方政府为公共设施和市政大楼向银行借了过多的负债，这些债务没有还本来源，到了今年是地方债还债高峰，从2012年地方债治理，没有让地方债减速，反而是大大加速，如果这个领域处理不好，就会导致突发性的金融市场崩溃，政府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是以中央政府的信誉保证其资金来源，于是今年年初发改委承诺地方债的还款来源，到目前将试点地方债的自发自还都是为了改变目前这种地方债的危机局面。

但是这种处理方式的后果是，大量的资源被集中到政府保护的领域，集中到经济无效率的领域，真正需要资金的中小企业和三农却承受了过高的市场利率，没办法，中央政府又想出了一招叫定向降准，就是要用这种方式对某些疲弱领域疲弱行业疲弱地区进行定向的扶持，但是这种由政府替市场做判断的方式，以非市场的办法解决市场的问题，最终效果估计将是适得其反。

对于区域性塌陷问题，目前在经济界是无解的，历史上也罕有先例，因为很难有针对性政策对某个区域，区域塌陷其实反映的是全局的问题，只有全局尘埃落定，区域的问题才可能有解。

中国经济困难应从五个方面着手

吴敬琏 香港环球经济电讯社 2014年6月12日

在现阶段，中国经济及改革面临着艰难险阻。目前业界有两种声音。一种认为应该救市，政府应该出台刺激性政策。一种声音认为不应该急于采取大规模刺激政策。知名学者吴敬琏日前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分析了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在目前经济下行状况下，吴敬琏认为，投资性刺激政策的效果在衰退，全面刺激政策不是好政策。

吴敬琏认为，如果部分地方面临资金链断裂，而且极有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这个时候，政府采取一些短期政策，比如信贷，货币等政策来防止系统性风险的发生，

是可以的。但是，“我不认为全面刺激政策是好政策。”吴敬琏分析，因为经济增长有结构问题，传统依靠投资刺激经济主要是针对重工业，而重工业吸收就业的弹性很低，带动就业并不明显。

那么，如何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呢？

“只有改革才能提高效率，从根本上解决困难，防止经济发生危机”，吴敬琏认为，接下来可以从五方面着手解决问题。

首先，停止没有回报的投资。有人认为基础设施多建一些没关系，放在那就好了，这不对。经济学中讲资源是稀缺的，应该放在有效率、有回报率的地方。在资源紧缺下，要停止无效投资。第二，让该倒闭的企业倒闭，目前有很多企业已经难以为继，依靠政府补贴维持，没有必要。第三，用政府资本弥补或有负债，比如用部分国有资本补充社保，降低国家负债和杠杆。第四，对很高负债企业进行资产重组。第五，盘活存量资产，比如很多地方的开发区，批了地，现在还没开发。总之，要减小经济中的风险，同时释放部分风险，才能防止经济危机的发生。

复杂经济局面挑战稳健币策

张幸 朱辉豪《香港商报》2014年5月28日

央行行长周小川本周到江苏分行视察时指出，须执行谨慎的货币政策和确保金融稳定。有专家指出，周小川的此种表态或许意味着央行不会很快下调存款准备金率，在经济“新常态”的框架下，央行仍将坚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预调微调政策，但此前李克强总理在内蒙古进行考察调研谈及货币政策时基调出现了明显变化，这仍然打开了市场对政策进一步微调的想象空间。

经济“新常态”挑战币策

周小川指出，中国经济正面临近年来少有的错综复杂局面，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防风险、惠民生任务繁重，对制定和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维护金融稳定、改善金融服务，都提出了新的挑战。

因此，人民银行各级机构要执行好稳健的货币政策，为全面深化改革和支持地方经济发展创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要进一步加强和改善金融监管，维护金融稳定；大力推动普惠金融建设，提升金融服务现代化水平，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特别是要重视运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普惠金融发展。

有观点认为，目前世界经济复苏存在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中国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深层次矛盾凸显，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意味着中国经济已然进入一个新周期、新常态，而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和促进经济发

展的有效手段，货币政策正面临着经济新常态的挑战。

经济下行宽松信号渐起

李克强在内蒙古考察时提出，要针对企业反映的实体经济资金总体紧张特别是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等问题，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适时适度预调微调，盘活资金存量，优化金融结构，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

高盛高华中国区经济学家宋宇认为，总理在谈及货币政策时基调出现明显变化，讲话比过去透露出更大的支持力度，包括提到要“运用适当的政策工具”、“适时适度预调微调”、“保持货币信贷‘合理’增长”、“营造良好的金融环境”。尽管其中很多内容并非首次提及，但在近期政策声明略显温和的情况下组合使用这些措辞显然是更进了一步。

“从今年3、4月的宏观经济数据来看，受制于偏紧的货币政策，投资到位资金增长明显低于同期投资增速，表明投资正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瓶颈，难以稳定下来。”光大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徐高说，这意味着目前的货币政策与稳增长的目标之间存在明显矛盾，只要投资到位资金状况不能明显好转，货币政策进一步放松的压力就持续存在。

他表示，李克强总理在内蒙古的讲话也表明，中央充分认识到了货币政策和稳增长目标之间的不协调，并要求货币政策做调整，因此，预计货币政策会进一步放松，全面降准是大概率事件。

全面降准可能性不大

兴业证券首席经济学家鲁政委认为全面降准很有必要，一方面，外汇占款等自然注入流动性偏少，需要央行主动释放流动性来平补；更为重要的是另一方面，高层关注的是融资成本，只有公开全面降准才有利于货币市场和债券市场的中长端利率回落。不过，表态谨慎的经济学家亦有人在，有观点认为央行仍将坚持通过公开市场操作预调微调政策，而非全面降准。

“不可否认，如果按照传统的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模式来应对经济下行，央行确实应当此时降低存款准备金率，通过总量宽松拉动总需求，但我们反覆提示，在‘新常态’的框架之下，政府的宏观管理思路已经发生重大变化，未来走老路、搞总量刺激政策的概率不高。”民生证券研究院管清友说。

方正证券认为央行进行大规模宽松的意愿较低，降准概率不大。报告称，二季度是货币政策持续微调的时间窗口，对于资金面来讲，由于央行微调直接以扩大部分金融机构特定领域的放贷能力为核心，因此不会带来资金面的宽松，而此前央行放松总以下调准备金同时公开市场回笼流动性为主要形式。

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央行原副行长吴晓灵日前曾表示，存款准备金率

已经成为对冲高额外汇占款的工具，存准率的调整会引起较大震动，而中国外汇占款数额巨大，降准吐出的头寸会对市场产生较大冲击，所以中央银行不会轻易全面调整存款准备金率。

科教文卫

高考改革不能脱离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

法国《欧洲时报》2014年6月6日

当诸如“高考誓师大会”、“烧香保过”、“学生撕书”、“城管劝大妈高考期间暂停广场舞”等新闻充斥报端时，你就会知道，大陆进入“高考模式”，各种情绪弥漫，紧张、压抑、煎熬与发泄。

在过去30余年中，高考尽管成为中国最重要的人才选拔方式，但“一考定终生”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如片面追求分数、人才评价标准单一、增加社会的集体焦虑等弊端，也一直是争议焦点。一张试卷检验所有考生、一个标准答案衡量对错，这无形中扼杀着中国孩子的想象力。分析称，今年以来，局面有所改观，一些地区及高校开始种种探索，以求打破目前唯分数而论的录取模式。浙江、广东等地区的高校，录取考生时不仅看高考成绩，还要结合学校面试或笔试成绩、高中平时成绩对考生进行评定。

这些探索和尝试增加了学生和高校双方的选择权，有助于那些综合素质良好、具备一定特长，考试成绩却不够突出的学生脱颖而出。过去，择优录取指的无非是分数第一，而现在，这个“优”具有了更多元化的涵义。机会多了，标准不唯一了，也有利于整个社会以更加平和、轻松的心态来对待高考。

只不过，外界担忧，在目前的社会大环境之下，如果缺乏监督，缺乏完善的制度设计，这些看起来选贤与能的新政，只怕沦为新一轮“拼爹”的战场，甚至反而更利于隐蔽的寻租活动。到那时，改变中的高考仍逃不出“形式上的公平”魔咒。

高考是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之间的枢纽，三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高考改革之外，基础教育如何推动素质教育，尤其是如何在教学条件落后的地区推动素质教育；高等教育的学科设置、培养方式、办学思路如何最大化激发学生潜能？如果脱离了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只单纯着眼于高考改革，从高考一路拼杀过来的年轻一代，依旧会堕落在当下大学舒适的安乐窝里。

教育改革的链条上一环扣一环，对应的正是一个孩子的一个阶段扣下一个阶段。

每年高考也就两三天时间，但教育改革的弦应时时绷紧。

深公立医院创新机制 为医改试点深路

郭若溪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12日

医改是一个世界性难题，而公立医院改革，被公认是医改的难中之难。2010年，深圳被卫生部确定为国家联系指导的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担负着为全国医改探路的任务。在过去几年的改革试点中，深圳不仅在全国率先取消所有公立医院药品加成，首创成立的深圳市公立医院管理中心更实现了对公立医院人财物和业务工作的统一管理，进入“管办分开、政事分开”的医改深水区。

“深圳目前的改革框架，是我国未来公立医院改革的基本方针，适应我国现在城乡的情况，特别是城市医疗服务需求的情况。”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马晓伟对深圳正在进行的公立医院改革给予了这样的评价。

集团化采购改运营模式

2013年5月9日，深圳市医管中心挂牌运作，正式启动公立医院管办分开改革。医管中心代表深圳市政府统一履行公立医院的职责，监管深圳市属11家公立医院和2家正在开业筹备阶段的公立医院的人、财、物等运行，推进公立医院体制机制创新。医管中心成立以来，制定并实施了公立医院改革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重点推动15项改革措施，着力推动从医院外部投入与监管、到内部经营与控制的全方位系统改革，加快构建现代医院管理制度。

补偿机制是公立医院运营的基础，改革打破了按人员编制核拨财政补助的做法，改为“以事定费，购买服务”；打破医院靠药品、耗材和设备检查收入维持运营的现状，改为主要依靠医务人员的技术劳动实现可持续发展。在改革医院通用耗材招采、医疗设备招采等物资管理制度方面，打破由各医院独立采购的方式，改为实行集团化采购，开展一次性注射器等五项通用耗材及监护仪等设备政府批量采购。

“从长远来讲，要探索建立‘建设靠政府、运营靠自己’的公立医院运营模式。”医管中心主任罗乐宣说。

港大深圳医院打包收费

作为内地公立医院改革的试点，2012年7月开业的港大深圳医院在管理体制方面实行了一系列创新，率先“去行政化”，建立法人治理结构，由董事会、医院管理团队、监事会分别负责决策、执行和监督。通过改革医院人事管理制度，打破传统编制管理制度，试行员额管理制度，实行全员聘用、岗位管理；打破按职称、按级别管理的工资分配制度，实行岗位薪酬制度。同时，医院实施了一系列以病人为中心的全新

诊疗模式，包括全面预约制、先全科后专科、专家领导下的团队诊疗，取消病人选医生；打包收费；建立病人关系科，加强医患沟通等。

国家卫生计生委副主任、国务院医改办主任孙志刚近日视察深圳时表示，港大深圳医院的办医理念和模式与内地传统做法有很大不同，是一个很好的尝试。对于这些新模式，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而不能套用传统的标准来衡量，最终应该从患者的角度来评价，以人民群众的满意为标准。“我们绝不是要再办一所传统的医院，而是必须找到新的理念，为国家的医改注入新的活力，提供更多先进经验。”

专家：医改忌盲目照搬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12日

2014年，中央将扩大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研究制订城市公立医院综合改革试点实施方案，达到每个省份都要有1个改革试点城市，并在借鉴上一批试点的经验上稳步推进。深圳已有的成功经验在被其他城市相继借鉴的同时，有专家提出，公立医院进行体制改革，“去行政化”才是打破利益垄断，破除改革顽疾的根本。

中国医院协会副秘书长庄一强认为，深圳公立医院改革一直走在全国的前列，包括港大深圳医院的试点示范模式都具有开创新。“该医院‘去行政化’，实行岗位薪酬制度，先全科后专科等均是非常好的试点创新，值得全国学习。但我们要认清的现实是，这样一间引进香港管理模式的公立医院在国内其他城市较难进行完全照搬，可谓‘孤岛效应’。”

开放医生“多点执业”盘活人才

社科院经济所公共政策研究中心研究员朱恒鹏亦表示，公立医院改革中需要一些配套的管办分开、政事分开、法人化等体制改革，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改革，深圳市医管中心已实现“管办分开、政事分开”内容的改革。其他如“加强管理”、“预约挂号”等并不是改革，而是一个加强公立医院内部管理的问题。“‘去行政化’不仅是破除垄断的改革，也是公立医院分级诊疗必须面对的事情，改革的根本也在于此。”此外，公立医院改革在积极推动社会办医时应开放医生“多点执业”，盘活精英人才集中聚集公立医院的问题。

安徽为承包土地确权 构建新农业经营体系

张玲杰、赵臣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20日

从小岗村大包干到率先在全国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安徽是中国农村改革的发源地。在以土地流转为核心的新一轮农村综合改革中，为农民承包经营土地进行确权登记颁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破解农村金融困局，安徽依然走在全国的前列。目前，安徽全省耕地流转率达到32.2%，全省农民合作社4.18万个，各类专业大户超过1.5万户，家庭农场近4万家。农民通过土地流转收入翻番。

庐江县是安徽省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县。近年来，经过积极探索，该县在农村经营体制机制创新、农村社会管理等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庐江县农业委员会主任陈宗泽告诉记者，庐江县的158.9万农用地中，目前已有60.12万亩完成土地流转，占总面积的37.8%，这一数字还在持续增加。

随着近几年农村青壮年外出打工数量不断增加，目前种地的农民多以中老年及妇女为主。现在，庐江县土地流转涉及农户8.2万户，这些农户除了拿到土地租金，还可以选择外出打工或就近工作，全年收入普遍翻番。庐江县是安徽的一个缩影，在安徽省的几十个县区，这场土地流转的改革正在积极推进。

培育新型经营主体

庐江县同大镇的潘英友是合肥市首个家庭农场的“法人”，潘英友在当地流转经营耕地1260亩，陆续投资100多万元，采用良种和先进技术从事农业生产，流转经营的耕地亩均纯收入比普通农户高出120元，实现年纯收入20多万元。

据介绍，庐江县近年来成功培育了330个“经营有规模、生产有服务、产品有订单、投入有信贷、风险有保障、科技有支撑”的家庭农场。这是以家庭成员为主要劳动力，从事农业规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生产经营，并以农业收入为家庭主要收入来源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县农业委员会定期对家庭农场进行集中培训，提高他们的农业技术水平。

创新多元经营方式

双福集团于2012年在庐城镇新桥村流转耕地12000亩，建设标准化优质粮油生产基地，并联合五个专业合作社，组建庐江县新桥农作物种植联合社，吸纳13个家庭农场和9个种植大户入股经营，形成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规模化经营、科技化服务、信息化交易于一体的粮油生产经营服务体系。

陈宗泽表示，土地的流转为农业龙头企业提供了生产基地，龙头企业与基地经营

业主签订合同，基地业主按合同约定进行标准化生产，形成了产、供、销一体化的产业化利益联接体，从而创新了经营体制机制，形成了“龙头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大户）”的产销新模式。

安徽去年底出台《关于深化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在全省20个县（区）启动农村综合改革示范试点，其他县（区）各选一个乡镇，有计划推进全省农村承包土地确权工作。安徽省委书记张宝顺表示，该省将力争到2015年底前，在全部试点地区完成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确权登记发证任务；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经营面积占承包耕地50%以上。

黔松桃工业园区给力县域经济

黄庆松《香港商报》2014年6月12日

近年来，松桃苗族自治县全力将工业园区打造成为“新型工业化的主体区、循环经济的试验区、东部产业梯次转移的承载区”，为县域经济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释放磁场效应推动产城融合

作为铜仁市黔东工业聚集区的重要组成部分，松桃自治县工业园区自2011年以来，按照“黔东工业聚集区”总体规划，围绕“主战园区、壮大产业、开辟新路、产城互动”的理念，着力抓好工业园区建设。

随着园区的迅速扩张，松桃工业园释放出强力的磁场效应，已初步形成锰钒复合新材料、新能源、承接产业转移、特色农产品等为主导的产业体系，引领工业经济转型升级，推动产城融合发展。

加大招商引资

随着工业园区的发展，县也加大了招商引资工作力度。在实际工作中，县工业园区成立了招商引资工作领导小组，围绕特色资源、产业优势，认真编制项目，积极为客商提供温馨快捷的“保姆式”和“一站式”服务。同时，做大做实政府融资平台，组建了武陵山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成立了贷款担保公司，并积极向国开行、农发行和各大商业银行争取融资。一系列举措奠定了全县优化经济发展环境的新理念、新目标和新要求，形成了亲商、安商、护商、稳商的良好态势，招商引资“洼地效应”逐渐显露。2013年，先后完成了水晶产业园、汽车贸易城、农副产品加工园、大米加工厂等89个项目的签约，签约金额达264.7亿元。

“城市没有产业支撑，即便再漂亮，也是一座空城。一座城市的核心竞争力取决于产业集群的实力，必须把建设产业园区、培育特色产业作为产城互动、协调推进、加快发展的结合点与突破口。同时，力争通过新型工业化建设三年大会战，到2016年，

实现工业总产值突破 100 亿元、规模企业达 100 家。”铜仁市政协副主席、松桃苗族自治县委书记冉晓东向记者介绍说。

农业规划 不求政绩 但为一村一寨好

芮田甜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7日

扼滇桂走廊的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既是云南省的东南门户，更是云南省在践行习总书记“一带一路”战略构想中，通往海上丝绸之路的最前站。文山全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92.3%，全州耕地面积仅占总面积的7.26%。2013年，通过总结过往发展模式，文山州编制实施了《“三农”发展大规划》（以下简称《规划》），通过一年时间，文山州走出了一条先行先试，以工促农的三农发展之路。

让领导干部对三农工作投入感情

“中国人在三代内，与农村没有关系的很少。”文山州委书记纳杰以这样动情的开场白，接受了记者的采访。2012年5月以来，甫一上任的纳杰躬身践行自己“身入文山、心入文山”的履新承诺，不辞辛劳深入农村调查研究，文山州“农业是弱势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的“三弱”现状，让他有了编制《规划》的决心：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州，要全力追赶全国全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只能立足州情农情，汇集民智民意，按照《规划》，科学发展三农工作。

规划编制一年来，全州各级各部门戮力同心，通过深入农村访农户、摸家底、取数据、查实情、顺民意，反复对接数据、征求意见、多易其稿，全面完成了“州、县（市）、乡镇（街道）、村民委、村小组”五级规划编制文本，开全国全省编制“三农”发展大规划的先河，基本实现了“自上而下、自下而上、上下同步、全面衔接”，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规划覆盖到“一乡一镇、一村一寨、一家一户”，特色优势产业发展规划项目覆盖到“一县多业、一乡一业、一村一品”的规划要求，做到了“民心所向、民意所期、民情所系”。

为了落实《规划》要求，完善《规划》细节，文山州组织了“千名干部下乡村”工作，以干部走入基层的方式，推动三农工作的进程。对此，纳杰表示，编制三农发展大规划，并非出于政绩考量，甚至在十年内亦难出现闪亮政绩，这样的规划，在实施过程中难免遇到阻力。唯有提高认识，让各级领导干部深入到农业合作社中，首先建立起干部对三农工作的感情和了解，再由感情加能力上升到责任心，方能真正推动好这一工作。

以工促农是常识

上任伊始，纳杰就敏锐地发现了文山州三农“大资源、小产业”的问题，过去主

掌大型国企的履历让他认识到，将工业发展的理念带入农业规划，并不是空喊口号，更不是异想天开，而是一件能够彻底盘活三农资源，提高农民积极性，保障农业收入的大事。在实施《规划》的过程当中，文山州通过扶持龙头企业、建设农村专业合作社这一“双管齐下”的思路，极大的加快了《规划》的实施，增加了农民收入，提高了农业产业水平，开创了以工促农的“文山模式”。

通过大力实施“内培外引”发展战略，采取优先给政策、给用地、给补助、给信贷等积极措施，文山州培育壮大了一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不断壮大，带动农民增收效果明显。截止2013年末，全州共有农业龙头企业180家，实现营业收入139亿元，同比增长30.73%，农业龙头企业带动农户20万户，实现户均收入1400元。

在《规划》中，以工业化的模式，高规格、高起点规划“三农”发展是一大亮点。过去，文山农民受制于交通不便捷、信息不对称、产业规模小等不利条件，种植业的收入较低，为了扭转这一局面，在实施《规划》过程中，文山各地组织了农业专业合作社，以农民互助的形式，明确种植类型，统一收购价格，联系供销渠道，达到了农业的高度集群化和规模效应，呈现可喜的发展态势。通过领导干部下乡指导，农民合作社发展不断加快，2013年，全州累计发展合作社1065个、新发展407个，其中国家级示范社4个、新发展1个，省级示范社45个、新发展15个，工商注册登记成员14097人，实有入社成员88976户，带动非社员农户165869户，成员出资13亿元，综合经营收入116555万元，同比增长40.6%，实现户均增收1200元。

在文山的广南县底圩乡普弄村农民合作联合社，创新设立了财务部、技术部、融资部、市场部、社员服务部、办公室等内部机构，并已规范运作，产业基地内的机耕道路、水利设施、土地整理等配套设施均交由联合社组织实施承建。

广南县底圩乡普盆村委会共14个村民小组，由于青壮年外出务工后，其中出现了6个“空心”村民小组，大量农田、茶山无人照管，土地、茶山、林地、房屋闲置，资源浪费情况严重。田地只能低价出租或转借给亲戚栽种，实现不了应有的经济效益，造成极大浪费。为此，乡党委、政府结合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在普盆老本地农民合作社实施“土地入股、保底分红”，即农民以土地入股，合作社采取统一规划、规模化种植的经营方式，发展特色农业产业，每年年底，农民可“坐享其成”。即按合作社经营利润的60%做为股利进行分红。截至今年，合作社已经发放6个村小组260余户群众的1600亩水田的保底收益金34万元。

“三权三证”创新农村金融

为破解农村融资难题，真正把农村“沉睡资产”变为“活动资本”，启动农村发展新活力，释放农村发展正能量，盘活农村资源价值，让农民拥有属于自己的投融资

渠道，文山州大力开展林权、土地承包经营权、农民房屋所有权及宅基地使用权“三权三证”抵押融资为重点的农村金融改革。

为了推进这一工作，各县（市）均成立了农村“三权三证”抵押融资工作领导小组及工作机构，研究制定出台了农村“三权三证”抵押融资相关配套政策，创新金融产品服务“三农”发展理念，以确权颁证为基础、以降低风险为保障、以能够抵押为目的，基本做到「有权必有证、有证可抵押」的要求，金融机构投向“三农”发展的贷款不断扩大。

富宁县在开展农村“三权三证”抵押融资的基础上增加办理渔业养殖证，渔业养殖合作社与信用社签订了贷款协议3641万元，现已获得抵押贷款1096万元，其他贷款手续正在办理过程中。该县归朝镇在云南率先成立了第一家乡镇小额信贷公司和第一家乡镇金融服务站，开创了全省先河。

三七之乡 特色为先

文山是著名的“三七之乡”，在实施《规划》的过程中，文山州始终坚持把发展高原特色农业作为重中之重，遵循“建基地、扩规模、深加工、创品牌、活流通、提效益”的原则，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优化农业产业区划布局，创新农业经营体制机制，培育扶持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增强农村发展活力，六大主导产业三七、烤烟、辣椒、甘蔗、木本油料、畜牧业发展态势稳中趋好，基本实现了量增效提的目标；新扶持培育的红豆杉、万寿菊、银杏、重楼、石斛、咖啡等产业发展规模不断扩大，综合产值效益逐步向好迈进；传统优势产业八角、草果、花生、油菜、八宝米、商品果蔬等发展面积稳中有升，农产品销售市场区域逐步拓展。2013年，全州预计完成高原特色农业种植产值226亿元，同比增长16.68%。

在发展特色产业的过程中，文山州坚持以区域资源为依托、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科技推广为支撑、以培育产业为主导、以农民增收为目标，产业配套设施建设不断加强。按照“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建设到哪里、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跟进到哪里”的要求，通过采取“财政资金投入一点、龙头企业（合作社）投入一点、农民投工投劳一点”的方式，特色优势产业基地建设取得新成效。2013年，全州共完成产业基地建设投资3.5亿元，其中建成产业运输道路1326公里、覆盖产业基地面积74万亩，建成产业水利工程8111件、覆盖产业基地面积22万亩。

闽率先打造农村电子版阿里巴巴

翁舒昕 香港《文汇报》2014年6月21日

农业部今月在福建召开的全国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工作现场部署会上，重点考察并肯定该省在信息化试点工程中的运作模式。目前福建在全省范围内已初步建立起省、市、县、乡、村5级农业信息化工作体系，率先推广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包括首个电子网络“世纪之村”，开辟“政府得民心、企业得发展、农民得实惠”的三赢模式，打造农村版阿里巴巴。平台不仅已覆盖福建省1.2万多个建制村，并在内地4.5万多个建制村推广使用。

今年以来，农业部在内地10省市22县试点信息进村入户，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和《关于全面深化农村改革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的若干意见》（即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全面推进农业信息化进程，以满足农民对信息服务的需求。农户不出村尽享信息根据规划，通过一个年度的试点，村级信息服务站在试点实现全覆盖，村级信息员选聘培训工作全面完成，全国农业系统公益服务体系实现横向跨省联通，纵向延伸到乡村。实现普通农户不出村、新型农业经营主体不出户，便可享受到便捷、经济、高效的生产生活信息服务。

“世纪之村”是福建省着力推广的内地首个农村信息综合服务平台。这个由当地农民企业家推动建设的网络平台，在政府政策支持下，成为内地颇具口碑的农业信息化模式。

6年前，农民企业家身兼兰田村支部书记的潘春来决定创办发展农村电子商务，在同一信息平台上叠加村务、政务等功能。“世纪之村”平台由此从兰田村起步。在这个网络平台上，村务公开、三资（指农村集体资金、资产、资源）监管、农家店、企业展品、村官家园等功能模块一应俱全。

解边远农民交易困难

福建泉州南安市康美镇兰田村村民许祖辉是村里的蘑菇种植大户，以前一天卖两三百斤蘑菇，自从成了“世纪之村”的用户，日均销售量达到2500多公斤。“世纪之村”创立了“网上农家店+实体农务产品公司+信息点”的商业模式，以网上农家店为运营中心，依托信息点收集、发布信息，进行农副产品采购、配送，实体农务产品公司则整合上下游供求资源信息，有针对性地寻找合作商家加盟网上交易，解决农民特别是边远山区农民的农副产品交易难、信息闭塞、成本高等问题，打造农村版的阿里巴巴。

网络成中国反恐新战场

《澳门日报》2014年6月26日

俗语说“蛇打七寸”。在当前声势浩大的人民反恐战中，除了要下重手、出铁拳，严打暴力恐怖和宗教极端团伙外，更要铲除暴恐犯罪整个链条，其中打击暴恐音视频最为关键。打击暴恐音视频，网络是主战场。

近年，内地暴恐活动一大特点是“网上传播，网下实施；境外煽动，境内实施”。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李健和日前在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上指出，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最大的恐怖威胁来自“东突”恐怖组织向国内的渗透，而渗透一条很重要途径就是暴力恐怖音视频。在中国近年发生的暴恐案件中，涉案人员几乎无一例外地观看、收听、宣扬、煽动暴力恐怖的音视频，中国境内发生的暴恐事件都与“东伊运”及其发布的恐怖音视频有直接关联。

资料显示，近年来，“东伊运”制作的恐怖音视频数量明显增长，尤其是在2013年出现爆发式增长，达107部，超历年总和，这一年，也是中国境内发生暴恐事件激增的一年。恐怖组织意识到，相对于此前派人潜伏入境实施恐怖活动、进行恐怖主义宣传的传统方法，通过互联网发布恐怖音视频进行恐怖主义宣传和煽动成本低、风险小、效果明显。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刑一庭庭长艾尼瓦尔指出，暴力恐怖音视频的极端危害性表现在，通过曲解《古兰经》教义，灌输宗教极端思想，宣扬所谓的“圣战”，实为煽动实施暴力恐怖犯罪；对中国政府攻击污蔑，诋毁民族政策，恶意挑拨民族关系，散布民族歧视，煽动反对党和政府；传授暴恐等犯罪技能，提供恐怖袭击及武器制造的具体操作方法，现实危害性极大；通过发布含有对妇女及儿童进行“圣战”洗脑、接受恐怖训练的视频，企图鼓动妇女儿童加入暴力恐怖组织。

中国政府很早就意识到“东伊运”恐怖音视频的严重危害。为了阻止音视频的传播，中国政府加强了对境内互联网、电讯市场和非法出版物的管理。然而，互联网给打击暴恐带来巨大挑战。“东伊运”正是利用了互联网资讯自由流动和国际互联网监管上的漏洞，将恐怖音视频上传到境外一些知名社交网站和视频分享平台上逃避打击，中国政府难以从源头上清理这些恐怖资讯。

与传统的恐怖活动相比，网络资讯传播更便捷迅速，并打破了时空对恐怖活动的限制，恐怖分子可以在第一时间组织、策划、控制恐怖活动；同时，实施网络恐怖活动资金消耗低，行动更隐蔽、攻击更有效、涉及面更广。与之相对应的是，网络反恐

难度更大。

恐怖分子除了在网络上传播暴恐音视频，宣扬极端主义宗教思想外，还借助网络散布谣言，例如2010年，有人利用网络制造的少数民族同胞“爱滋病打针”事件，目的是制造社会恐慌，挑拨民族关系，引起民族仇恨。

面对挑衅，中国决心彻底铲除暴恐音视频这一“毒瘤”。今年三月三十一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五部门联合发布《关于严禁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的通告》。

《通告》发出后，新疆各地、各部门加强了查处、打击传播暴力恐怖音视频工作，公安机关侦办利用网络、手机等新型媒体实施宗教极端犯罪案件二百二十六起，共打击处理二百三十二人。

近日，国家互联网资讯办公室宣布，在全国范围启动铲除网上暴恐音视频的专项行动，加强打击网上传播暴恐音视频、发布暴恐行动实施方法以及售卖相关作案工具的违法犯罪行为，严厉惩罚发布暴恐音视频资讯、售卖境外资讯传播工具的网站，坚决切断暴恐分子利用网络传播宗教极端思想、煽动实施暴恐案件的渠道。

当前，中国反恐形势异常严峻，在这场正义与邪恶力量的对决中，广大互联网企业应自觉加强检视网上内容，清除涉暴恐资讯，坚决不为暴恐音视频提供传播渠道；人民群众应自觉拒绝暴恐音视频，不传播、不信谣，积极检举揭发，为打赢事关社会安定大局的网上反恐战作出贡献。

两岸四地 世界各地

两大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

郑德力 香港《镜报》2014年6月

欧洲大陆爆发动乱，乌克兰濒临内战，克里米亚半岛公投，闪电回国俄国，而太平洋上的钓鱼岛也不太平，美日联手遏制中国的火药桶正在形成。东西局势变化可说是遥相呼应，美国在两个危机中都争取拉第一小提琴，其他大国则只是偏重本身的地理位置上的矛盾的解决。由于钓鱼岛危机和乌克兰危机直接发生在几个大国之间，当事国皆为世界经济超级大国和强国，而不像以往几十年那样，政治危机或军事冲突多数是发生在中小国家的范围之内，即使二战后的国际局部很赞正不断，也多数是个别大国对小国的侵略战或在另一方大国不完全介入的代理人战争。因此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具有新的时代特点，首次出现冷战以来大国互相直接对峙的政治军事矛盾，而且原来处在第二线的欧盟及日本也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崭露头角，这将给稳定的世界经济带来更为复杂的参数。政治军事矛盾冲击世界经济将不可避免，欧美即使有点投鼠忌器，仍然重新对俄国挥舞起冷战时期惯用的经济制裁手段，显示出矛盾的计划。

美日联盟对中国经济的挑战

正当乌克兰局势恶化之际，奥巴马4月底国事访问日本，一举改变了美国外交政策高高在上的常态，可说是从对日冷淡转向采取了对日绥靖政策。奥巴马以美国总统的身份公开支持安倍的钓鱼岛政策，宣布美日安保条约适用钓鱼岛问题，并且欢迎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给日本重新军事化开了绿灯，正式抛弃了美国在中日岛争之中本来不选边站的暧昧立场，不再那么羞羞答答。

奥巴马东京之行之后，美国官方机构尝试淡化处理奥巴马的“亲”日表现，美国处境比较尴尬复杂。一方面，美国当然不愿让日本隐然成为逼宫美国获得成功的赢家，更不能让美国反而在亚太政治被矮化，变成一个被安倍拉下水的客体而不再是隔岸观火主持大局的主体。另一方面美国还不能放弃在钓鱼岛问题和东海问题上牵制中国和进行更大交易的放长线战略，美国总统不可能彻底变成安倍的政治“粉丝”。但是形势比人强，安倍设下东京鸿门宴逼使美国表态，一个“美国怕日本，日本怕朝鲜”的现实链在安倍的导演下，被奥巴马正式验证通过。

日本哪来的力量，竟然能引导奥巴马访问东京，朝见天皇，为安倍背书？答案是，经济，经济，主要还是经济。

尽管在军事上美国仍遥控着日本，不会放松，日本的经济生产技术力量却是美国所需要的，甚至不可缺失的，日本的先进科技生产技术和核心部件产品成为了美国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中国近年来主要以加工代工的生产方式参加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大循环，那么日本在美国二战后发动冷战的时期就抓住机遇，以发展先进生产技术，不声不响地深深进入了美国经济体系。美国许多科技优势的出现，相当一部分是脱离不了日本的电子产品及新材料等等的贡献，波音787梦幻飞机的40%部件靠日本提供，可见水乳交融之程度。表面上中国对美国贸易顺差声势浩大，中国出口商品核心价值仍然有局限。

2013年中美贸易总额5210亿美元，美日贸易总额徘徊在2000多亿美元水平，但是日本的出口产品和赴美投资在质量上对美国经济影响力明显超过中国。曾经吃过败仗灾难的日本可进可退，如果更大的世界经济大危机一旦发生，日本的经济和社会的危机承受力将相对而言较大。

正当美日攻守联盟在钓鱼岛问题上浮上水面之际，中国经济将离开长期的高热阶段，增长放慢与产业结构转型的调整也正在全面深入展开，情况相当敏感。至今为止，中国与美日的政冷经不冷，美国大银行期望亚太资金因区域政治动荡而大举流向纽约，这个潮流也还没发生。亚太经济发展与军事局势有所脱钩，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要完全脱钩也是不现实的事情。

乌克兰危机牵动俄与欧盟经济

亚欧的国际政治动荡可能触发世界经济衰退，目前看来，发生在欧洲大陆的或然率超过在亚太地区。中国不是美国学界所说的那样，是乌克兰危机的赢家，然而突如

其来的乌克兰危机恶化，以及欧美对俄国经济的制裁，的确将严重打击普京积极展开的新一轮经济改革开放计划。

俄国为保证本身的政治军事安全空间，不得不牺牲暂时的经济利益，被迫以将坚决行动向欧美发出威慑信号。普京的强硬态度有失有得，也可能反过来扩大欧盟与美国的利益不完全相容的裂缝，弱化了欧盟参加美国推动的大西洋自由贸易区谈判的积极性。乌克兰危机持续发展期间，卢布与俄国股市发生一定程度的下跌，但是欧元保持强势，兑换美元汇价不降反升，美元汇率没有特别旺盛，欧洲与亚太一样，也还没发生资金大举流向纽约现象。大炮一响，黄金万两的历史不是每天重演，美国大银行的专家分析，有一种神秘力量在影响着国际金融市场。

军事威胁下的国际经济再平衡

局部常规战争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不可低估，特别是几个大国直接参与的军事对抗，对世界经济的打击将是致命的。俄国如果对欧美制裁采取任何的反击，包括对欧能源供应的中断，将很容易促使欧盟经济滑入严重衰退，美国的复苏和调整零利率的政策将无疾而终。普京至今为止在经济反击方面仍然按兵不动，非常谨慎，这毕竟是两败俱伤的下策。对于国际大家庭来说，新的世界经济再平衡或许已经是在悄悄地进行中。不但欧美企图在经济上击垮俄国，俄国在政治和军事上持强硬态度，或许也在趁机显示，美国已经不再拥有二战中远离主战场的地理优势。在双方军事对等威慑下，经济决战才是关键的。对美国来说，无论是钓鱼岛危机或是乌克兰危机，美国经济失衡的严重情况超过了军事失衡，美国的国内外经济如何再平衡的难题已经超过其在世界各地的军事再平衡问题。

学术前沿

解析司法体制改革

继2014年2月底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二次会议明确司法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原则之后，6月6日召开的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司法体制改革试点若干问题的框架意见》《上海市司法改革试点工作方案》和《关于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方案》，决定就司法体制的四个重大事项，在上海、广东、吉林、湖北、海南、青海6个省市先行试点，并针对7个重点难点问题提出了指导方向。备受关注的司法体制改革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改革要兼顾长远之计和当务之急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明楷**：在司法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既要找到导致司法腐败、司法不公正、司法无权威等现象的深刻根源，也要找出这些现象的直接原因；既要充分考虑到《决定》规定的各项改革措施的难度，以

及可能导致的负面效应，也要周全设计出各项应对措施；既要明确长远之计是什么，也要知道当务之急是什么。在当下，治本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治标措施**，治本就会步履维艰。（《湖北日报》2014年5月19日）

以法制思维和方式推进改革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王琳**：最高法院和最高检察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刑事速裁程序试点方案”6月27日一次过审。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试点方案”，也具有了“法律”的地位，这还是中国内地第一次有明确施行地点和施行期限的法律。先立规再改革，这是新一轮司法改革的看点。在法制恢复重建36年之后，守法、护法已然超越了试法、创法，成为法治建设的第一需求。面对现行法，司法机关没有了“绕着走”的天然理据——司法改革也要有法可依，依法而为，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司法改革才是法治的常态。（《南方都市报》2014年6月30日）

制定法官监督法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说，司法工作有特殊的规律，要给法官和检察官特殊的职业保障。现在，行政官员有监察法，但是对法官的监督和保障主要还是靠最高法出台的一些规定，比如违法审判人员的责任追究，法院工作追究处分条例等。未来，要制定一部国家层面的法官监督法。（《法制晚报》2014年6月16日）

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 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岚**：由于现阶段，我国司法人员和地方法院、检察院的经费，主要按行政区域实行分级管理、分级负担的体制——即由同级地方财政统筹拨款——这使得司法机关很容易受制于地方行政部门，助长了审判和执行中的地方保护主义，影响司法公正，乃至滋生各种司法腐败。湖北作为本轮司改的6大试点省市之一，已经成立司法改革领导小组，邀请了许多专家担任小组成员。目前已经开会讨论了好几次，讨论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去地方化’和‘去行政化’，但尚无具体方案。讨论认为设立跨行政区域法院为司法去地方化的一剂良方。（《中国青年报》2014年6月27日）

分类管理加强防腐监督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对法院、检察院的工作人员实施分类管理是世界通行的做法。分类管理是把法院、检察院里的工作人员分成三类，第一类是一线负责办案的法官和检察官；第二类是司法行政人员；第三类是辅助人员。实施分类管理后，对于法官和检察官就要实施单独管理。一方面要对其加强监督，使其清廉、不腐败、不渎职、力求办案公正，同时，未来对法官和检察官的遴选应更加严格；另一方面要提高他们的待遇，即使做不到丰厚，也至少应与责任相匹配。（星岛环球网 2014年6月16日）

应杜绝院长、庭长办案签字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围绕此次司法改革的内容，至少有法官法、检察官法、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等四部法律应进行相应的完善修改。现在法官办案，并不是由主审法官负责，而是由院长签字、庭长签字负责制，在有些个别地方，甚至是审委会签字。在这种情况下，一旦审判出现

问题，也是无法追究法官个人的责任的。此次改革的一个重点是去行政化、去地方化。“原来是由组织部对法官进行任免，负责组织工作的人，可能不一定了解法官、检察官的专业。设立遴选委员会，由法官、检察官、学者组成，更有利于考察法官、检察官的专业水平。”（《法制晚报》2014年6月16日）

建立科学的遴选任命机制 北京理工大学法学院教授、司法研究所所长**徐昕**：“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法官、检察官遴选、任命机制。”在英美等国家，有从律师到司法官的法律职业转换机制，英美国家的法官大都是从有多年执业经验的律师中遴选出来的。而在我国，依据《公务员法》将法官、检察官纳入其调整范围。一个普通人要想成为法官，需要通过司法考试和公务员考试，只有连闯两关的获胜者才能成为法官。这种选任制度，使得司法官和行政官被混同管理。“司法行政化”使得法官、检察官管理与公务员趋同，无法体现司法官的职业特殊性，而行政职级却成为衡量司法官成就的主要标准。（《中国经营报》2014年6月28日）

中央应加大司法经费投入 中国政法大学前校长、终身教授**陈光中**：本次司法改革提出“推动省以下地方法院、检察院人财物统一管理”是非常正确的。尽管规定财和物要集中到省级，但省级的财和物并不一定要由省里全部承担，省以下的地方原来承担的费用要上交到省里，由省里统一管理。同时，中央也应有相当的财力、物力投给省里，今后中央应加大司法经费的全国性的投入比例，为将来人财物权统一收归中央创造条件。只有这样，改革方案才能顺利实施，不能劫富济贫，压低对条件好的地方的经费投入比例，提高条件差的地方的经费投入，变相搞平均主义。（新浪网 2014年6月16日）

应提高法官待遇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姜明安**：在司法改革试点中，法官的待遇和地位，都应该高于院长、庭长等非审判人员的待遇。改革之后，法官办案就要负责到底，就算已经退休，也要终身对案子负责。同时，待遇提高后，法官更珍惜自己的职位，贪污受贿的情况将大幅减少。姜明安分析，改革后，法官的数量会大量减少，在提高法官待遇的同时，要给每个法官配置助理，最终提高法官岗位的神圣性，吸引更为优秀的法律人士投身法官行业。（《法制晚报》2014年6月16日）

本资料所登言论不代表本编辑部观点, 仅供党政领导和决策部门参考

责任编辑：吴健涛

本期编辑：何楚龙

校对：李媛媛

地址：城站路85号孝感市图书馆

电话：2823087

编辑日期：2014年7月15日